

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宋 健 姜春云 杨旭宇

提 要：本文围绕怎样理解人口均衡发展，人口均衡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以及如何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三个主要问题展开讨论。均衡发展既是人口发展的目标，也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均衡，重点是发展。从单维人口增长视角拓展到多维人口发展领域，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人口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积极应对少子化老龄化结构挑战的现代化，更是人口素质不断提升的现代化。中国式人口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通过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依托中国式现代化框架重建人口现代化理论，以人的发展为核心促进均衡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人口均衡发展 人口现代化 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一个醒目的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口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性要素，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色。2022年，中国首次进入生育主导型人口负增长，人口形势发生重大转折性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那么，怎样理解人口均衡发展？人口均衡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是什么？在人口负增长的新形势下，如何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本文将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高质量发展视域下中国人口均衡发展的理论建构与多维测度研究”（项目编号：20&ZD173；主持人：宋健）的阶段性成果。

一、均衡发展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2017年,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的表述,指出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随后,“高质量发展”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一同成为描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高频词。在经济领域,近几十年来,发展观已从追求经济增长转为兼顾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发展;在人口领域,长期以来,人口增长形势备受瞩目。无论是人口转变时期的过快增长,还是后人口转变时期的负增长,都吸引了政府和民众的目光,控制过快增长或扭转负增长成为相关政策的目标。相对而言,关于人口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尚有不足。均衡发展作为人口发展的目标,也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均衡,重点是发展。

(一) 发展观从只追求经济增长转为兼顾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发展

在早期,发展被等同于经济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开启各国现代化历程,发展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兴起。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发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刘易斯,2015)。在这一时期,很多国家发展政策的首要甚至唯一目标就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即“以GDP为核心的增长”。20世纪六七十年代,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只关注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一方面,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对环境、生态带来极大压力甚至是毁灭性破坏。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森(Rachel Carson)所著《寂静的春天》一书描绘了农药污染对环境所带来的致命破坏,唤起了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卡森,2018)。另一方面,贫困、失业、分配不均等问题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解决,学者们开始反思发展的意义。1968年,瑞典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Karl Gunnar Myrdal)发表《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指出“发展意味着整个社会体系的进步”(缪尔达尔,1992: 305);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在《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托达罗,1992: 50—51)。

对仅关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的反思改变了有关发展的观念,可持续发展理论和人类发展的理念被提出。1976年,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1976)将“基本需求战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向国际社会推荐,认为发展

应该以满足公众的基本需求为目标，要关注社会不平等现象，在 GDP 总量、人均 GDP 之外，还需增加社会指标以衡量发展成就。1972 年，世界环境大会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并未得到重视，直到 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也被称作《布伦特兰报告》）中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这一概念的要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0：19）。1990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首份《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人类发展”的定义，认为人类发展是一个不断扩大民众各种选择的过程，其中三个最基本的选择维度是健康长寿的生活、获得知识和获取体面的生活所需的各种资源，并通过构建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对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进行测度（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1990）。

回溯发展观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人类对经济增长的理解不断深入，从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领域，最终指向人类自身的发展。中国在经过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后，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概念，要求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指引新常态下经济保持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以及平稳健康运行。

（二）单维视角：人口从过快增长转为负增长

长期以来，人口领域的主要理论围绕人口转变展开，聚焦人口增长。人口转变理论基于欧洲国家的人口实践，总结死亡率、出生率、自然增长率三个主要人口指标的变化历程，归纳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高低”经历“高低高”转为“低低低”形态。这一变化历程首现于欧洲，随后陆续在其他国家出现。目前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完成了人口转变，还有一些国家仍处于转变前阶段和转变过程中。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过快增长现象和人口转变完成后出现的负增长现象都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和普遍焦虑。人口过快增长现象源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的时滞效应。由于在人口转变中，死亡率率先下降，出生率并不会自然而然下降，而是需要育龄人群具备生育的自主意识、对少生优势的认知以及掌握节育技术三个必要条件后（Coale, 1973），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逐渐下降。在一些国家，出生率还会受到控制生育政策的推动加速下降。在这一过程中，仍然较高的出生率与已然降低的死亡率之间的差值形成了较高的自然增长率，人口总量快速攀升。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全球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按照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22 年数据估计，

1950 年到 1970 年的 21 年间,有三分之二的年份全球人口自然增长率超过 20‰,其他年份的自然增长率也均超过了 15‰。同期世界人口总量从 25 亿人增加到 37 亿人。^①这一时期的人口高增长率和总量快速攀升使人们发出“只有一个地球”“地球不堪重负”“增长达到极限”等惊呼,悲观论甚嚣尘上。

随着人口转变完成,欧洲率先出现人口负增长,随后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陆续出现负增长,负增长问题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焦点。人口负增长通常指总量负增长,由自然增长和迁移增长构成。不考虑迁移增长时,人口负增长就主要取决于自然负增长。自然负增长源于低生育率现象。一般而言,死亡率降低水平后较为稳定,当出生率过低、出生人口数不及死亡人口数时,就会出现人口自然负增长。一些欧洲学者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试图解释生育率突破更替水平不断向下的内在机制 (Van de Kaa, 1987); 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低生育率陷阱”假说,认为总和生育率降到 1.5 以下,低生育率就会在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三重机制下自我强化,难以提升 (Lutz & Skirbekk, 2005)。欧洲于 1998 年出现人口总量负增长,在 21 世纪初期又回归正增长,2020 年再次出现负增长。如果不考虑迁移因素的话,欧洲人口负增长出现得更早,自然增长率自 1993 年就已转为负值 (-0.4%),且除了个别年份外 (2009—2014 年),均维持自然负增长。发达国家整体在 1974 年平均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 (TFR = 2.07),之后呈现缓慢下降态势,2018 年出现自然负增长,2021 年总量负增长。

不同国家的人口转变道路有所不同,中国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耗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历程,具有压缩性、超前性等特点,展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与此同时,压缩性和超前性的特点也使得中国人口在总量庞大和极低生育率的条件下提早进入负增长阶段,且将在未来面临较严峻的快速负增长局面。中国于 1992 年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在 2020 年降到 1.3 的极低水平,在 2022 年同时出现人口自然负增长和总量负增长。

(三) 多维协调: 均衡发展作为人口发展的目标

人口系统内含总量、素质、结构、分布等诸多要素,与生育、死亡、迁移等重

^① 数据来源: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22,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Online Edition。本文有关世界人口的数据,除非特别指出,均源于此。

要人口过程相互作用，同时与社会经济文化、资源环境生态、政策法规制度等外在因素紧密相连。人口增长是人口总量变化的矢量指标，虽然通过人口平衡公式可连接其背后的生育、死亡、迁移等人口过程，也可借助再生产指标了解人口内在增长趋势和世代更替水平，但人口增长本身并不能完整地展示人口发展全貌。目前对于人口发展似乎存在两种误用，一种是将人口增长等同于人口发展，认为人口发展就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的过程，因此在讲述人口转变等规律性现象时，直接使用人口发展的概念；另一种是将发展等同于社会经济发展，探讨人口与发展的关系时，将发展视为人口系统外的内容。如果类比经济领域发展观的演变历程，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人口增长不等于人口发展，讨论人口发展需要将单一维度的口增长拓展到人口总量之外的其他多维要素。

均衡发展作为人口发展的目标，涵盖人口系统内诸要素及其与外系统各要素间的关系。“均衡”是一个多学科概念，在不同学科中定义有所不同。如从哲学角度来看，物质有追求均衡的本性，这种本性是物质发生变化的原因；均衡可分为主观均衡和客观均衡，前者是物质存在的内在基础，后者是物质存在的外在条件，两者相互依存（曹全喜，2007）。物理学意义上的均衡是指，相互对立的各种能动力量同时作用于一个系统，且作用力相互抵消，使系统处于稳定状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课题组，2010；张俊良、郭显超，2013）。生态学意义上的均衡是指，生态系统中的各环境要素处于和谐共生的状态，由于能量循环导致内部结构变化和能量运动之间形成动态平衡（关卓今、裴铁璠，2001）。经济学所关注的均衡主要具有变量均等和行为确定两方面含义，前者是系统中对立的双方（或各方）能动力量平衡均等的状态，决定系统内各要素是否协调；后者是系统中对立的任何一方均不具有改变现状的动机和能力，因而使系统处于稳定状态，决定均衡状态的可持续性（樊纲，1991）。社会学意义上的均衡则源于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有机体论，指社会系统维系、保持、调适和修复不同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过程（邓伟志，2009）。综合不同学科的“均衡”概念可以发现，不同系统、要素、力量之间的互动过程推动事物趋向于稳定状态，其中蕴含了均衡发展的意涵，即从非均衡状态恢复至原有的均衡状态或者转向新的均衡状态，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地从非均衡走向均衡的周而复始、循环往上的过程。因此，均衡发展的核心是均衡，但重点是发展。

人口发展可视为与人口相关的诸要素之间的互动状态和过程。人口均衡是指人

口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并且实现人口总量适度、人口素质提升、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合理分布及人口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协调平衡发展等目标（翟振武、杨凡，2010）。人口均衡发展则是要素间相互协调，使人口总体保持在均衡状态或从非均衡状态转为均衡状态。均衡发展是偶然态，非均衡发展是常态，在不同阶段呈现的各类人口问题均可视为人口非均衡发展的表现。人口均衡发展可分为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两个方面，对人口系统内要素与外部诸要素间的关系及其均衡发展的认识，存在两种倾向性。一种观点认为，二者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紧密联系的整体，人口内部系统的失衡会对外部因素产生溢出效应，人口外部因素的失衡会对人口内部系统产生冲击效应，二者协调统一构成总体均衡（张俊良、郭显超，2013）；人口内外均衡分别决定人口供给和创造人口需求，供需不断调整、相互适应，有效匹配时呈现人口总均衡（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课题组等，2010）。系统内外诸要素需要保持“共同进退”，才能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特别是人口变量的变化具有长期性、世代复制性的特点，所产生的影响在短时间内无法消除，因而人口各个方面需要共同实现均衡发展，不能优先发展其中一方面，然后再发展另一方面（翟振武、杨凡，2010）。另一种观点认为，二者存在主从适应关系，即或者通过社会经济手段和科学技术手段影响人口变化，调节人口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系统之间的关系（李建民，2010）；或者通过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特别是调整生育水平，使人口规模、结构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匹配（原新、刘旭阳，202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22）。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人口系统要素变动的滞后性与人口外系统变动的灵活性，现实中二者间常常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

人口转变理论描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型”均衡态向“现代型”均衡态转变的过程。问题在于，一方面，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型”均衡态并未在人口转变完成后如预期般实现，而是被极低生育率带向负增长的新的非均衡态；另一方面，以人口总量增长为核心的人口转变理论并未充分展示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分布等其他人口要素的作用，以及少子化老龄化等结构性挑战、区域发展非均衡等重要问题。当大多数国家遵循人口转变描述的规律完成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面对低生育率和负增长的现实，经典人口转变理论已无力解释；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聚焦婚姻家庭，略显狭隘。这就要求我们跳出单维视角，从多维协调的角度重新审视人口发展，用新的理论解释全球人口所面临的这些全新现象与全新挑战。

二、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人口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从单维人口增长视角拓展到多维人口发展领域，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人口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理解人口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基于人口现实，充分发挥人口要素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积极应对少子化老龄化结构挑战的现代化，更是人口素质不断提升的现代化。中国式人口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人口现代化概念将人口再生产类型与人口素质有机结合，对人口转变理论进行了拓展，还应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框架出发，通过助力个体发展、赋能家庭发展，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的总人口规模长期居于世界前列，1982 年成为世界首个人口超过 10 亿人的大国。^①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基本国情和鲜明特色。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开启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在人口规模上迥异于中国，在发展的外部环境上迥异于当前这个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没有现成经验可遵循，需要我们自己探索、做好面临巨大挑战的心理准备。

虽然中国人口已于 2022 年进入负增长，但仍然会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保持人口规模巨大的特点。根据联合国中方案人口预测结果，2035 年之前中国人口总量都保持在 14 亿人以上，2050 年总人口预计为 13.2 亿人。^② 与此同时，也须关注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育龄人口等每一个子人口的规模变化。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人口超过 14 亿人，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接近 9 亿人，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64 亿人，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1.91 亿人。这既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总量压力和结构挑战被视为中国

① 印度于 1997 年人口超过 10 亿人。

②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22,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Online Edition.

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在新发展理念下，充分利用人口规模巨大的特点，变压力为动力、化问题为优势，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巨大的人口规模曾是负担，更是资源，需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把握这一辩证关系。人口和人手构成一对基本矛盾，人口意味着消费，人手意味着生产。在生产水平低下、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时期，人口规模主要被视为负担，“人口多底子薄”，再大的经济总量和资源总量从人均角度看都变小变弱。在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当前和今后，人口代表着相对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和需求旺盛的国内市场，需要扭转人口正增长特别是快速正增长时期形成的人口观，视人口为资源而非负担，妥善解决当前和今后由于人口结构和分布、供给和需求匹配等产生的问题，保护人口资源，提升人力资本。

人口规模巨大还意味着结构复杂和需求多元，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关注差异性和多样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区域差异大也是中国基本国情。就人口规模而言，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既有人口超过1亿人的省份（如广东和山东），也有人口不足1000万人的省份（如西藏、青海、宁夏）；既有人口不断聚集的地区（如东部沿海地区），也有人口不断流失的地区（如东北三省），各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也存在巨大差异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不断提升、更加多元的人民群众的需求，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压力，也是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驱动力。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积极应对少子化老龄化结构挑战的现代化

数量、素质和结构三大要素在人口系统内相辅相成。其中，结构要素的作用需要被充分预见、审慎对待、积极应对。因为结构要素蕴含巨大的能量却往往不易被察知，如人口惯性就源于人口年龄结构，在人口快速增长时期所形成的年轻的人口结构，使得人口即使已经呈现内在负增长，仍会维持总量正增长的态势。中国人口从1992年的内在负增长，到2022年的总量负增长，惯性正增长持续了30年之久。未来当人口进入长期负增长轨道后，也要预判因年龄结构造成的惯性负增长，即人口总量止跌回升相较于内在正增长会有一段滞后期。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死亡率保持在低水平并进一步下降，滞后于死亡率的出生率持续下降，二者都会在客观上增加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例。死亡率下降、平均预期寿命延长，还会导致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其他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所不同的是，中国老龄化速度快，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特征明显，且老年人口规模庞大。在总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劳动力人口、育龄人口、老年人口自身的老龄化现象也很突出。劳动力人口的老龄化在一些领域则会对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产生阻碍；育龄人口的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生育率的提升；老年人口的老龄化即高龄化，伴随的是身体机能的进一步衰退和生活自理能力的逐渐丧失，对长期护理资源形成压力。

少子化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后人口转变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如果说人口老龄化是人类进步的必然表现，整体上可预期，而由超低生育率所导致的少子化则令人猝不及防。中国由于总量庞大，在较长时期内年出生人口数都在 2000 万人以上，即使在 1998 年后降到 2000 万人以下，随后的十几年间也基本保持在年 1600 万人左右的出生规模。然而，在 2016 年达到 1786 万人的小高峰后，近些年的出生人口数呈现断崖式甚至是腰斩式下降，2022 年跌破千万人口，只有 956 万人。出生人口数的猝然下降是中国提早出现人口负增长的直接原因。

造成少子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队列效应，由于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时期出生的较小规模队列逐渐进入婚育年龄，使得育龄人群的总量相对于以往有所缩减。其二是结构效应，育龄人群本身老龄化，20—29 岁适龄生育人群的比例不断下降。其三是社会效应，受教育年限延长、婚育年龄推迟、婚育观念转变等社会经济因素导致育龄人群的生育率显著下降。这些因素均对出生人口数的持续下降发挥着作用，从而造成少子化现象。队列效应和结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可根据人口规律预知，但社会效应特别是年轻队列婚育观念和行为的改变则具有不确定性，是影响生育率高低和出生人口数量多少的关键因素。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素质不断提升的现代化

少子化老龄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长期伴随性问题，素质要素则是在人口减量发展前景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可依仗的力量。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人口政策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为核心内容，在人口过快增长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人口素质大幅度提升。

从衡量人口素质的健康和受教育程度两类指标来看，在健康方面，中国人口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 43.7 岁提升到 2021 年的 78.2 岁，65 岁时和

80 岁时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从 1950 年的 9.1 岁和 4.3 岁增至 2021 年的 17.7 岁和 7.8 岁，意味着不仅人口总体寿命延长，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也有更长的平均余寿。以每千名活产婴儿中死亡婴儿数量和 5 岁以下儿童死亡数量计算的婴儿死亡率和儿童死亡率指标分别从 1950 年的 131.8‰ 和 208‰ 降至 2021 年的 5.7‰ 和 7‰，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关指标的距离进一步拉近。^①

在教育方面，中国近几十年来教育飞速发展，人口受教育程度显著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事业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教育普及成效显著。1986 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全国实施 9 年义务教育制度；1999 年高校扩招，2019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 50%，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2021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7.8%。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文盲率（15 岁及以上人口中不识字人口比例）从 1964 年的 33.58% 降至 2020 年的 2.67%；每 10 万人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从 1964 年的 416 人增至 2020 年的 15467 人；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 9.91 年。^②

（四）在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框架下进一步拓展人口现代化理论体系

人口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个关系人口发展的理论体系。人口学家刘铮教授于 1992 年首次提出人口现代化的概念，将人口现代化与优先发展教育结合起来。他认为，人口现代化的提法有助于站在战略高度看待和分析人口问题，是遵循人口发展规律所作的科学概括；人口现代化的内涵既包括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现代化，也包括人口素质的现代化（刘铮，1992）。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现代化就是通过人口转变所实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反映人口自然变动的特征；人口素质的现代化则是加速国家现代化实现过程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前提条件。当前中国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当时所描摹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现代化已然实现，但是低出生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现实发展超越了人们的预期，特别是持续低迷的生育率、迅速加深的人口老龄化和猝然降临的人口负增长成为新的挑战，要求我们重新认识反思人口再生产类型现代化的内涵要义；人口素质的现代化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距离建成人力资

①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22,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Online Edition.

② 数据来源：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本强国还任重道远。

人口现代化概念将人口再生产类型与人口素质有机结合，对人口转变理论进行了拓展。事实上，人口转变理论本脱胎于现代化理论体系，因为人口转变的背景是现代化，或者换言之，现代化推进了人口转变。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下降都受到现代化力量的推动。但是，在人口转变理论中，现代化是作为外生因素或背景存在的，人口现代化则致力于探讨人口自身的发展目标与路径，既包含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也包含人口素质的显著提升，后者是人口现代化不可忽视的特征之一，也符合人口发展多维要素协调的要求。

从人口发展多维要素协调的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人口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在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中，“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均与人口均衡发展息息相关，后者可视为人口外部均衡的一种表现。以人口均衡发展为目标，人口现代化的概念除了容纳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和人口素质提升之外，还可拓展至更宽广的维度，包容更多要素。经典人口转变理论聚焦人口增长，预测了出生率与死亡率实现双低后的低自然增长，但并未预料到出生率进一步低于死亡率后的人口负增长；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认为，个体主义兴起和婚姻家庭制度变化是造成生育率持续低迷的原因，欧洲各国先后实施家庭政策，促进家庭发展、帮助生育率提升。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下，中国式人口现代化还应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框架出发，进一步拓展理论体系，通过助力个体发展、赋能家庭发展，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三、人口负增长形势下通过均衡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人口负增长是后人口转变时代生育率持续低迷条件下人口发展的必然表现。人口负增长具有不可持续性，长期严重的负增长会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甚至损害国基。要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贯彻新发展理念，采取质量替代、结构优化和空间回旋等发展策略，统筹治理少子化老龄化问题；以人的发展为核心促进均衡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一）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现适度生育水平

“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202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提出的2025年要实现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明确要求。目前，顶层设计框架已基本完成，关键在于落实落地，通过部门联动，努力扭转在人口过快增长时期形成的对生育不友好的社会氛围，清理和消除现行政策制度中阻碍生育的附加性条件，通过提供经济、时间、服务等一系列支持措施，解除人们生育的后顾之忧，实现适度生育水平，避免人口长期严重负增长。

婴幼儿无人照料的问题是造成很多家庭“想生不敢生”的一个重要阻碍因素。其根源在于社会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不健全，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有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改革，一方面带动了中国经济腾飞，另一方面也对教育、医疗、托幼等领域带来冲击。以往由单位、街道等承担的托育服务在市场化冲击下被极大削弱甚至消解，育儿几乎完全成为家庭的责任。在普遍一孩生育政策时期，大多数家庭通过祖辈介入等方式尚能勉强解决婴幼儿照料的问题，但随着生育政策的宽松化实施，仍由家庭承担婴幼儿照料就变得困难重重。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建立需要社会治理思维，动员多主体参与，以方便家庭为目标：一方面在数量上要有极大拓展，尽可能满足家庭的托育需求，突破生育率提升的瓶颈因素；另一方面要在质量上有保障，可根据这几年的经验进一步完善2019年印发的《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为托育机构的质量保驾护航。在实现“十四五”期末每千人口4.5个托位数的国家基本要求基础上，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测算供需，尽量满足家庭需求。

如果说建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主要是提供生育的服务支持，假期延长和津贴发放则是提供生育的时间和经济支持，对于提振生育信心同样重要。多个全国性调查显示，“生育成本太高”是制约育龄人群生育的主要因素。生育成本既包含经济成本，也包含机会成本。特别是对女性而言，工作家庭冲突以及生育可能带来的就业歧视、岗位晋升机会损失等，使其“不敢生”“不愿生”。延长假期的根本在于提供带薪产假、鼓励父母双方共同参与育儿活动的育儿假，还需要明确成本分担机制，为企业提供适当的税费减免，以避免对女性的歧视，为家庭提供安心养育子女、没有后顾之忧的职业环境。但假期并非越长越好：其一，太长的假期不利于女性重返职场，可能造成技能生疏或职业陌生感；其二，不利于企业的理解和认同，因为在

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下，企业的成本付出毕竟是有限度的。需要在假期制度设计上更为科学合理，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接力产假后的婴幼儿照料。发放津贴的目的同样是减轻家庭的生育成本。但津贴发放额度在不同地区、对不同人群的效果并不相同，发多了政府承担不起，更遑论可持续性；发少了对家庭没有实质性帮助。所以津贴怎么发、发多少、发给谁，需要在配套支持措施实践中因地制宜制定细则，以取得效益最大化。

目前生育支持措施已经在多个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其一是释放出强烈的政策信号，表明国家支持生育的态度和诚意。从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时期抑制生育的导向转为负增长时期支持生育的导向，生育政策的转向将有助于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向。其二是从经济、时间和服务上提供了生育支持。虽然总体而言，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还正在构建过程中，各地的步幅和步速还有差异，但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有益于增加家庭的生育信心、缓解家庭生育的困境。其三是有助于减缓生育率下降的趋势，期待在未来进一步扭转生育颓势。由于低生育率的成因极为复杂，生育政策本身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还需要社会各领域通力协作，在就业、住房、教育、税收、养老等方面共同改变生育不友好的现实。

（二）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治理少子化老龄化问题

少子化老龄化社会所蕴涵的风险前所未有，需要清醒地认识和把握其内在规律，积极预防、妥善应对。如果以千万级别来观察出生人口数，1949年以来绝大多数时期中国的出生人口数都在1000万人至3000万人之间；1963年最接近3000万人的高限；2022年则可视为少子化的标志性年份，出生人口数跌破1000万人下限，直接将总人口拖入负增长的轨道。^①中国自2000年左右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处于中度老龄化阶段，预计在2035年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2023年，近3000万人的出生高峰时期队列集体迈进60岁门槛，加剧了人口老龄化程度。少子化与老龄化相互交织，必须一体应对、协同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规划纲要》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要求“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

^① 数据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21，《人口与家庭发展常用数据手册（2019）》，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务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可采取质量替代、结构优化和空间回旋等发展策略，统筹治理少子化老龄化问题。

质量替代策略是针对少子化老龄化社会情境下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数量相继减少的态势，以高质量发展替代以往的数量取胜策略，将人口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开辟新的发展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这既是对人口素质现代化的具体要求，也是通过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人口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通过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将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强大的优势，推进中国式人口现代化。过去，中国长期占据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位置，依靠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和巨大的消费市场在几十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目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数量和规模扩张让位于质量和效益提升。质量替代策略的本质是追求内涵式发展，从“大”到“强”。在人口发展进入负增长的新形势下，应从关注数量增长转向关注素质提升，为此应优化儿童发展环境，完善青少年发展制度，提高高校、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匹配度和劳动参与率，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完善小微创业者扶持政策，创造良好的政策、体制和法治环境，以科技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

结构优化策略是针对少子化老龄化社会年龄结构重心上移、“头重脚轻”的问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制度包容性，充分开发老年人口红利和性别红利，创造新的发展机遇。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处于加速发展期，20 世纪 80 年代严格计划生育之前出生的庞大人口陆续进入老年阶段，这一事实并不会随着生育率的变化而变化，需要我们重新认识老年人口，采取适当措施充分利用这一丰富资源。有必要在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健康素质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探索老年的界定新方式，逐步完善渐进式延迟退休制度。要意识到老年人代际间的和内部的异质性，积极利用蕴含于有知识、有文化、有财富积累的新老年群体中的人力资本存量。创造适合老年群体参与的机会和资源，通过信息无障碍建设和终身学习保障，使老年人在共享数字生活的基础上继续贡献智慧。虽然中国女性“能顶半边天”，劳动参与率在世界各国居于前列，但社会性别平等仍需持续推进，应不断改善妇女发展环境，

消除就业性别歧视，推进工作—家庭平衡，深入开发性别红利，通过促进妇女平等依法行使权利、更广泛参与社会劳动，促进经济社会稳定而持续地发展。

空间回旋策略是针对中国区域差异大、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充分利用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的条件，抓住各地区少子化老龄化进展的时间差，化区域发展劣势为全域发展优势。区域差异大既是我国发展“不平衡”矛盾的根源，也是可用来辗转腾挪的优势。已经成功实施的“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等国家战略性基础设施工程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一基本国情特点。上海等东部地区作为中国较早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地区，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经济活力，也是得益于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的贡献。在少子化老龄化社会背景下，应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引导调控社会资源，促进资源要素顺畅流动。根据区域特点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准确定位，避免同质化和齐步走的弊病，兼顾现代都市发展和绿色生态发展。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破除劳动力和人才在城乡、区域和不同所有制单位间的流动障碍，在发展新格局中实现发展新飞跃。

（三）以人的发展为核心促进均衡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依托中国式现代化框架重建人口现代化理论，除了跳出人口增长进行“拓维”外，还需要深刻把握“一切发展为了人、发展的一切为了人”的发展理念。人口均衡发展不仅意味着人口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的动态均衡，还要求人口系统与外系统间实现动态均衡。这其中，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最为紧密，也最受人关注。

早期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蕴含在人口与土地等生产资料、人口与粮食等生活资料、人口与财富等经济资源的关系之中。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所著的《人口原理》首次构建了较为清晰的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框架，将人口增长和粮食增长通过两个级数加以描述，指出如果不加抑制，人口增长将超过粮食增长，并造成贫困问题（马尔萨斯，1992）。马尔萨斯提出的解决方案并不是通过技术手段增进粮食产量，而是通过积极性抑制（提升死亡率）和预防性抑制（降低生育率）两种方式来实现人口与粮食之间的均衡。人口被视为经济增长运行中的一个内在因素，调节人口变量（主要是生育率）以适应经济增长的传统沿袭至今。比如，发展经济学家们一直关注人口增长和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国家的发展目标更可能是经济发展而不是人口发展。

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人口红利”能否持续、会否消失等问题备受关注。“人口红利”是一个经济学概念,通常与人口规模或结构有关。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少儿人口比例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尚未大幅提升时,会有一段总人口抚养比降低时期,可称为“人口机会窗口”,若能充分利用这一时期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或可收获人口红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是抓住了人口机会窗口期,通过劳动密集型就业和遍布全球的“中国制造”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获得了丰厚的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转变完成,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总人口抚养比随之提升,人口规模或结构意义上的传统“人口机会窗口”逐渐关闭,通过开发老年人资源、女性资源等收获“老年红利”或“性别红利”成为热议话题。事实上,对人口红利的执着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将人口视为经济工具的片面观念。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人口是无数个体的集合,是人民的数量化体现,人口发展而不单纯是人口增长应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中的主旋律。重新审视人口外部均衡中人口与其他要素间的关系,在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中,除了关注开发人力资源创造新的“人口红利”之外,也应尊重人口自身的发展规律,不能削足适履;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中,利用减量发展的契机,提升人的环保意识 and 责任意识,恢复青山绿水,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建设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现适度生育水平、积极应对人口少子化老龄化结构挑战等过程中,尊重个体和家庭的意愿与需求,以人的发展为核心,促进均衡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参考文献:

曹全喜,2007,《均衡论》,北京:华龄出版社。

邓伟志,2009,《社会学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樊纲,1991,《论均衡、非均衡及其可持续性问题》,《经济研究》第7期。

关卓今、裴铁璠,2001,《生态边缘效应与生态平衡变化方向》,《生态学杂志》第2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22,《认识人口基本演变规律 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管理世界》第1期。

卡森,蕾切尔,2018,《寂静的春天》,王晋华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建民,2010,《论人口均衡发展的概念与要义》,《人口研究》第2期。

刘易斯,阿瑟,2015,《经济增长理论》,郭金兴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刘铮, 1992, 《人口现代化与优先发展教育》, 《人口研究》第2期。

马尔萨斯, 1992, 《人口原理》, 朱泱、胡企林、朱和中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缪尔达尔, 冈纳, 1992, 《亚洲的戏剧: 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 谭力文、张卫东译,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课题组、马力、桂江丰, 2010, 《以科学发展为主导 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 《人口研究》第5期。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1980, 《我们共同的未来》, 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托达罗, 1992, 《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 印金强等译,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原新、刘旭阳, 2021, 《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长周期思考》, 《学海》第4期。

翟振武、杨凡, 2010, 《中国人口均衡发展的状况与分析》, 《人口与计划生育》第8期。

张俊良、郭显超, 2013,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理论与实证模型研究》, 《人口研究》第5期。

Coale, A. J. 1973,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pul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Conference, Liege.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1976, *Employment, Growth, and Basic Needs: A One-World Problem—Report of the Director-General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Lutz, W. & Skirbekk, V. 2005, "Policies Addressing the Tempo Effect in Low-Fertility Countri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1 (4).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1990,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Van de Kaa, D. 1987, "Europe's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Bulletin* 42 (1).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宋健)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姜春云、杨旭宇)

责任编辑: 罗 婧